

重写比较文学学科史

比较文学：从民族国家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 涯 陈佑松

摘 要：比较文学的诞生和演变其实内蕴着现代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张力，也展示了民族国家从冲突向交往，并进一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比较文学学科不仅仅是文学间的影响与比较，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文明在近现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键词：比较文学 民族国家 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10.13760/b.cnki.csalt.2024.0053

从 1886 年英国文学理论家波斯奈特出版第一部《比较文学》起，到今天，比较文学史已经走过了 130 多年，完成了从德国滥觞到法国学派，再到美国学派直至当代中国学派新阶段。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也已经跨越了从现代到后现代，从殖民时代到全球化时代的诸多重大阶段。站在 21 世纪 20 年代，在人类文明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比较文学史，我们发现，比较文学的诞生和演变其实内蕴着现代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张力，也展示了民族国家从冲突向交往，并进一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比较文学学科不仅仅是文学的影响与比较，更重要的，它是人类文明在近现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时代政治书写研究”（20BWW033）阶段性成果。

一、“民族国家”认同：比较文学学科之肇端

德国比较文学学者胡戈·狄泽林克在其《比较文学导论》中认为，比较文学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别文学的思维。他说：“有人认为文学研究首先要服务于本国本民，在可能的情况下，大学教学和科研中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亦当同本国本民利益联系在一起。”“有些人竭力倡导文化民族主义……一切都流露出他们反对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 and 情绪。我们认为正是这些实际的和潜在的敌人非常准确地描绘了比较文学家的形象，并以此（虽然并未善意）帮了我们的忙。”^①狄泽林克站在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为比较文学学科合法性辩护。在他看来，国别文学往往用文化民族主义来否定比较文学，这是比较文学最大的障碍。比较文学就是要超越民族主义，要跨民族国家文学进行研究。

其实，狄泽林克激烈的言辞揭示了比较文学一个无法摆脱的因素：国别文学。方维规在这本书的译序中专门讨论了“国别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的翻译。他特别注意到“nation”在中文里的翻译问题：“这里存在对西方近代以来‘Nation’概念的理解问题：一般以‘国家’解，在一些具体或特殊的情况下以‘民族’或‘国民’解；而‘National literature’中的形容词‘National’基本上是指‘国家的’，间或也有‘民族的’意思。”^②在这里，译者似乎把民族和国家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正是这样的理解，导致国内比较文学界对“跨民族”还是“跨国家”产生了争议。我们认为，“nation”应该翻译为“民族国家”，它是一个同时包含了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概念，表述着近代以来世界逐渐形成的国家体系。如果不深入阐释这个概念，我们既无法理解比较文学本身的文化政治基础，也无法真正理解狄泽林克的焦虑。

马世力在《世界史纲（下）》中给“民族国家”下了定义：“民族国家是指近代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治经济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或多民族的国家体制，与封建时代通过武力或封建权力建立的王国或帝国有着本质的区别。”^③民族国家的最初形式是民族君主国，它出现在文艺复兴之后。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谈道：“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用拉丁语；罗马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

① 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② 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译者序，第2页。

③ 马世力、于群、董小川主编：《世界史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① 中世纪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原因，基督教普世帝国开始转变为民族君主国。1648年的欧洲各国签订了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条约“破除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瓦解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德意志各诸侯邦获得了主权和独立，欧洲政治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格局。主权国家从此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先是以世俗‘民族君主国’的形式出现，后来又发展成‘民族国家’”^②。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国家不再是国家、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由公民（仅指19世纪末以前有财产的公民）组成。”“民族国家的这种近代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进。”^③ “1798年革命开始后，法国在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面对欧洲各国的联合绞杀，拿破仑帝国在抗击反法联盟的战争中迅速扩大，一度统治了大半个欧洲，法国的民族意识也在扩展中走向了反面，形成了所谓的‘民族沙文主义’……法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曾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于民族主义所提供的巨大精神力量”，而“民族沙文主义的扩张激发了被侵略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进而为民族反抗所击败，这恰恰是历史的辩证法”。^④ 德国民族国家建构较英国、法国等要落后半个多世纪。直到1871年，德国才通过三次战争实现了政治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落后的德国有着强烈的危机，这也激发起了它甚至比法国还要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德国发动20世纪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其根源可能都与其民族国家建构的焦虑有关。

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参与其间：印刷资本主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认为，印刷资本主义促成了宗教改革、民族语言发展和民族认同的开始。^⑤ 印刷资本主义中，文学自然是最重要的部分。于是我们能够理解，近代以来，特别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文学必然与民族国家关系极为密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55页。

②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③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55页。

④ 马世力、于群、董小川主编：《世界史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8页。

⑤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46页。

切。欧洲文学参与本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民族主义成为此时欧洲文学的重要特征。如果对比较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同鸣共振。

学界通常把比较文学的滥觞追溯到德国的浪漫主义者赫尔德。他是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发表过有关文学比较的论述。

赫尔德非常认同民族主义的文学观念,他说:“我们一定不要责备任何一个国家,说他们喜欢自己的诗人胜过所有其他的诗人,还说他们不想抛开自己的诗人以交换外国的诗人;毕竟他们是它的诗人。他们用它的语言进行了思考,在它的语境中运用过他们的想象力;他们感受到了养育自己的民族的需要,并且以满足了这些需要作为回报。那么,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应该也与他们一起体验呢,既然由语言、思想、需要、感情织成的纽带牢固地把他们联结到了一起?”^①与此同时,赫尔德也说:“任何对我们国家的热爱,都不应该阻止我们认可任何一个地方的美好事物,它们都是在众时代和众民族伟大的进程中才累积地创作出来的。”^②“我们的知识都是从其他民族那里获得的……大自然铸成了一条新的链带,即让文明从一个民族传播至另一个民族。”^③

当然,赫尔德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意识是以民族意识的确立为基础的,其目的是唤起和强化德意志的民族意识。赫尔德的上述言论分别发表于1770年和1797年,此时欧洲正经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民族主义风暴席卷了整个欧洲,但德意志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德意志的统一恰恰需要外在思想的刺激,特别是法国革命思想的冲击。所以黑格尔会称赞拿破仑是“马背上的世界灵魂”,而歌德也称赞拿破仑说“他的一生就像迈大步的半神”。西方思想史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德国自身内部缺乏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动力,缺乏实现德国统一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力量,他们才极为迫切地希望引入外国的力量。拿破仑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为德国思想精英的偶像的。这也说明,包括赫尔德、黑格尔和歌德等在内的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人,他们的“比较意识”其实是从其民族国家建构的立场出发的。所以,歌德的“世界文学”论,不是别的,正是德意志民族文化建构之所需。在狄

① 赫尔德:《古代及现代各不同民族的诗歌比较之结果》,胡根法译,张沛编,《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② 赫尔德:《古代及现代各不同民族的诗歌比较之结果》,胡根法译,张沛编,《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

③ 赫尔德:《论文明的进步》,姚小平译,张沛编,《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泽林克看来,比较文学没有能够在德国发展壮大,其原因就在于德国19世纪强烈的民族主义:“沿着赫尔德的路径而来的,注重民族性而发生的对‘一般文学史’的兴趣,被正在兴起的、强调民族意识的日耳曼语言文学驱散以后,强调‘比较文学史’的呼声在19世纪下半叶才高涨起来。”^①

当比较文学在法国兴起的时候,这种民族意识则带上了法国色彩。17世纪,路易十四在黎塞留的辅助下,在欧洲最先完成了中央集权,实现国家统一,使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第一强国,民族意识随着民族自豪感开始凸显。法国大革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拿破仑战争和欧洲的反法战争则从正面和反面强化了它的民族主义精神。与赫尔德和歌德大致同时代的斯达尔夫人的作品也聚焦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她对德意志文化的讨论、对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的对比,都已成为研究19世纪欧洲思想和文学的经典。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绝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把斯达尔夫人看作一个世界主义者。要知道,她的思想恰恰是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欧洲民族国家意识的反映,所以她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化之比较,乃是在强调讨论文学需有民族国家之眼光。

这种民族主义观念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然是法国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脉络。狄泽林克注意到,到20世纪,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尔登斯贝格、加雷和基亚依然保留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在巴尔登斯贝格和加雷那里,比较文学对国别文学研究的义务感有时还是很突出……巴尔登斯贝格所宣传的关系研究,总是有可能不仅在课题方面,而且在研究中,把法国文学史和精神史放在中心位置。……直到1951年,它还在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的理论中继续发挥作用。为了法国比较文学的继续发展,基亚所热衷的论题,不是外国对法国的影响,就是法国对外国的作用。”^②

综上所述,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事实上,我们都可以论证,比较文学是中世纪帝国瓦解后民族意识崛起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建构的结果,也是其重要表征。不过,我们同时也发现,早期比较文学在维护民族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天然地具有了跨越民族国家的意识。当然这种跨越意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局限在欧洲或西方文明范围之内。

① 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译者序,第14页。

② 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译者序,第39页。

二、“欧洲文明共同体”建构：比较文学之拓展

1892年，戴克斯特登上了里昂大学教席，并发表了《外国和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该校在不久后即设立比较文学教授职位。这标志着比较文学在法国站住了脚跟。狄泽林克对此评论说：“戴克斯特重视的是超国界思维和欧洲思维，他在报告的结尾甚至呼吁‘欧洲精神’。”^①在狄泽林克看来，法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够比德国发展得顺利，就在于法国学者抓住了比较文学的核心特征：跨民族国家。这构成了法国学派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影响研究就是在这一语境下结合实证主义确立其地位的。但是在德国，由于一直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的焦虑，这种跨民族国家的视野没有建立和稳固下来，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但是，即使是法国学派，比如戴克斯特、巴尔登斯贝格、加雷和基亚等人，基本上都是把比较文学跨民族国家的范围限制在“欧洲”。

1921年，巴尔登斯贝格在回顾1900年巴黎比较文学大会时，对布吕纳介进行了评论。他说：“这次会议由F·布吕纳介主持，他做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有的地方是专门性的报告，就比较文学（被人们认为欧洲文学史）的对象、方法、纲领和范围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布吕纳介按他的方式将集体‘组织’的老概念，从民族主题转移到‘欧洲’的平面上”。^②同时巴尔登斯贝格也注意到，“一些小国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他们国家的民族性比较弱，因而他们具有某种世界主义的本能，尤其是G·勃兰克斯、E·D·洛德、马尔克·莫尼埃和V·罗塞勒等人的名字，和这种‘欧洲主义’有着关联，无论怎么说，‘欧洲主义’对囿于小国范围的情感来说，是一种飞跃”^③。

1931年，梵·第根出版《比较文学论》，他说：“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之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古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④梵·第根虽然没有

① 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译者序，第20页。

② 巴尔登斯贝格：《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徐鸿译，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43页。

③ 巴尔登斯贝格：《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徐鸿译，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9页。

④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明确排除欧洲之外的国家的文学，但是他的所有论证都只在关注欧洲文学。

1951年，基亚《比较文学》出版。该书第一章“起源与历史”明确认为：

比较文学是由于世界主义文学的觉醒而产生的，它兼有历史地研究世界主义文学的意愿。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们结合起来，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竟然法国化、哲学化了。这初期的三个阶段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时间长短不一的语言统一时期——至少是承认一种被普遍运用，并受到热爱的语言占了优势的时期。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民族独创性被肯定了，并与各种文学频繁接触，变得空前的一致起来。……直到世纪末，他们所预想的、向世人宣告的比较文学，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和相对独立的学科出现。^①

基亚在这一简短的描述中说明了欧洲文明的分分合合：它有着中世纪基督教拉丁文化、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共同文明基础，浪漫主义时期分化为民族文化，但是这些民族文化与文学不断交流比较，形成了比较文学。也就是说，比较文学本身既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同时也有着欧洲共同文明的基因。基亚的论证，说明了在比较文学诞生的早期阶段其所具有的浓烈的欧洲文明色彩。

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狄泽林克在写作《比较文学导论》的时候，仍然明确地表示，比较文学是一门如此具有欧洲特色的学科！他说：

比较文学……在促进各个群体的一体化过程中（这尤其适合欧洲范围），它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欧洲精神生活中，没有一个领域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像文学这个自由天地一样，作为各种民族思维模式和情感思潮的集散地而得到充分利用和发展。那些最深沉、最隐蔽的东西，往往是那似乎无法推倒的民族隔阂的大墙。鉴于欧洲民族和区域的不断联合，我们要探讨欧洲思维模式和流派，很大一部分得借助于文学问题的超国界研究。比较文学是一门如此具有欧洲特色的学科，没有一门学科能像比较文学那样把自己的生存归功于这个大陆的“差异中的统一”。^②

① 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② 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译者序，第7页。

狄泽林克的著作深刻地反映了欧洲比较文学精神的文化和政治基础：欧洲曾经是一个帝国，有着长达近两千年的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帝国的同一的文化和政治基础，近代以来形成了民族国家体系，但民族国家的独立并没有完全消除统一的欧洲文化的记忆。所以，在民族国家文学发展的同时，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跨国文学观念产生了。这就是比较文学之开端。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比较文学发展的早期，民族国家文学和跨民族国家的欧洲文学形成它内在的强大张力。欧洲文化认同和欧洲政治一体化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获得了更深入的推进。

狄泽林克的《比较文学导论》首次出版于1977年，第二版在1981年，第三版在1991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初版和再版时间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若合符节。1976年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各国在战后《欧洲钢煤联营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基础上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次年，狄泽林克的《比较文学导论》出版。1973年，英国、丹麦、爱尔兰加入欧共体，1981年希腊加入，1986年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欧共体发展为12国，其国民总产值已远超美国。此间，狄泽林克的《比较文学导论》再版。1991年，欧共体首脑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基于该条约，1993年，欧洲联盟成立，欧洲一体化进程大大向前迈进。与此同时，狄泽林克《导论》第三版出版。

从巴尔登斯贝格到狄泽林克，我们看到，虽然比较文学学科逐渐明确了它的跨民族国家性质，但是这种跨越是有欧洲边界的。这说明，比较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欧洲文明共同体现代自我认同的重要表征。

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兴盛起来后，民族国家意识和欧洲文明共同体意识都被突破了。1958年，教堂山会议上，韦勒克提交了《比较文学的危机》这篇文章，激烈地批评了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影响研究”，提出了“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方案。不仅如此，他还特别论证了影响研究背后的民族主义动机。他认为，比较文学的兴起，原本“是作为对19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对法、德、意、英等国许多文学史家所持的孤立主义的反抗”，然而，“这种想充当两国之间的中间人和调停者的真诚愿望，却常常被当时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①他进一步列举了巴尔登斯贝格、伽列、库尔提乌斯等欧洲比较文学名家的研究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并加以批评：这些国家“比较文学的研究者虽然基本上出自爱国动机，

^① 勒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5—266页。

却造成了一种记文化帐的奇怪现象。他们尽可能证明自己国家对其他国家多方面的影响,或者更为巧妙地证明自己国家比任何国家都更能充分吸收和‘理解’外国的大师,以便将功劳都记在自己国家的帐上”^①。这显然与比较文学朝向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的目标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韦勒克强调一定要真正跨民族国家,而平行研究就是重要的途径。

1965年,韦勒克在哈佛大学召开的比较文学学会大会上致辞,发表了《今日之比较文学》,回应了论争对手对他的批评。有人认为韦勒克“虽然是欧洲生人,却不再对战后世界主义试图重新弥合欧洲相互敌视的国家关系的努力感兴趣”。韦勒克反驳说:“多年来我一直主张正确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共同的倾向,西方传统的总体(在我看来还应该包括斯拉夫世界),我坚持认为,比较文学的最终理想是比较研究包括远东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②这段话包含了几层意思。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开始了重建和一体化的进程,比较文学的主流趋势是上述狄泽林克所表达的欧洲认同。第二,韦勒克承认自身的研究集中于西方传统的总体。也就是说,他作为欧洲裔美国人,深刻地认同欧洲文化,同时也把它表述为“西方文化”,这样实际上就将北美等源于欧洲的文化涵盖进去,以区别于东方文化。第三,韦勒克还提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标是要比较研究包括远东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这看来是遥远的、前瞻性的,而非当时比较文学之任务。

韦斯坦因在1973年的文章中明确表示,他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③由此可见,美国学派还是没有能够跨出西方文学和西方文明的藩篱,离比较文学“总体文学”和歌德“世界文学”的愿景尚差之甚远。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趋势:比较文学之旨归

前述比较文学学科从肇端到法国学派的兴盛,其政治文化基础是民族国

① 勒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7页。

② 勒内·韦勒克:《今日之比较文学》,《辨异》,刘象愚、杨德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页。

③ 韦斯坦因:《比较文学的定义》,刘象愚译,张沛编,《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5—126页。

家建构和欧洲一体化认同,战后的美国学派则把这一基础扩大到了西方文明。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比较文学的重心逐渐开始向中国转移,形成“中国学派”。中国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突破了欧洲和西方中心主义,将“跨民族国家”比较拓展为“跨文化”“跨异质文明”研究。这既是全球化加速的文化表征,也是比较文学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

乐黛云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在20世纪初发轫,20年代后作为一种学科开始孕育,尽管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原因,中国内地的比较文学在60至70年代处于一种沉潜状态,但港台地区的比较文学却在这一期间率先繁荣起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大发展的前驱。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界,压抑了多年的学术热情和创造力像井喷一样迸发。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最具开放性、先锋性的学科之一,得到了迅速的复兴和迅猛的发展。”^①

中国比较文学在发展初期也是从“民族性的自我认同出发”,然后才是“逐渐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自觉”^②,从章太炎《诂书》、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到鲁迅《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再到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等,均带有强烈的文学比较意识,不过其目的是要借鉴西方文学和文化,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提供支持。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起源于19世纪中期以后,是在西方殖民争夺的高潮中被强行纳入全球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创立同文馆翻译西书,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外交机构管理民族国家外交事务,在北京设立外交使领馆接纳外国驻华使节,也向英法等国派出公使。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比较,中国开始确立自身的民族国家意识。清末民初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试图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推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但民国初年政治实践的失败让人们寄希望于文化革命。中国比较文学的开端和第一次高潮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中国比较文学也是发端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需要。

但是,正如李达三所说,中国比较文学并没有停留在民族意识的狭窄范围里,而是“逐渐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自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开始建立,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也开始向中国转移。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展开讨论:

第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是全球化加速的历史性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很快进入冷战状态,两个阵营的文化也出

① 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张沛编,《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2页。

② 李大三、罗钢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

现了隔阂与斗争，这在韦勒克的文章中也能看到，如西方比较文学与苏联比较文学界之间的相互敌对。但是，社会主义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率先走出了冷战阴影，开始了改革开放，即对内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对外实行对外开放，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几乎同时，西方也开始了它们的“改革开放”：由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自由主义改革。西方的改革是为了改变统治西方多年的凯恩斯主义，从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以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经济全球化改革几乎同向而行，这使得中国经济和文化与世界深度融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也能够站在全球的视野中，与世界文化充分交流、对话和比较。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比较文学热潮，正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往的重要表征，它成为中国学术界理解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形成了不同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重要特征。首先是“跨异质文明”的特点。前已述及，比较文学从诞生以来经历了民族国家认同和欧洲/西方认同两个阶段，到了 80 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特别强调的是东西方异质文明之间同样具有可比性。钱锺书《谈艺录》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① 曹顺庆 1995 年在《中国比较文学》第 1 期上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基本特色概括为“跨文化研究”。“如果说法美学派在跨国和跨学科上跨越了两堵墙的话，中国学派就跨越了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② 今天，这样的文明交流已经被明确表述为“文明互鉴”。其次，“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兼收并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文学形成本来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影响”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就是探讨西方小说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形成的。当然，既然是交流，学者们也关注中国文学如何影响西方文学。如叶维廉和赵毅衡都专门讨论中国古代诗歌如何影响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观念的形成。“平行研究”则以钱锺书为代表，他的皇皇巨著《谈艺录》和《管锥编》正是秉持着总体文学的观念，在具体问题上进行平行研究的。曹顺庆的新著《比较文学变异学》则融汇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历史和实证的影响研究深入讨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事实交流，文化和审美上的平行研究则关注人类文明

①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 页。

② 曹顺庆、王超等：《比较文学变异学》，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6 页。

面临的共同问题。早在 90 年代中期,曹顺庆就梳理出“跨文化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寻根的模式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研究方法,多种方法的同时运用“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①,这恰恰凸显了中国比较文学开阔的全球视野。最后是学科交叉。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比较文学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文学研究范畴,而成为文化比较和文明比较,所以,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多种学科参与进来,共同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第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意味着世界文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今天的全球史学者都注意到,18 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世界是一种多中心的状况。欧洲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多个文明系统并行,相互碰撞、交流、对话。直到欧洲爆发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生产力迅速提升。在随后的 200 年间,资本主义携带着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向全球猛烈扩张,将本来属于地方文化的欧洲“现代文化”变成了世界现代文化的基本样态。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由此产生。可以说,比较文学从诞生到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都没有摆脱这种文明模式。这是历史语境使然;同时,它们也有意识地在强化这种世界结构。

但是,世界也在发生变化。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列强被严重削弱,大量殖民地经过斗争获得了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冷战期间,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展开了对峙,新兴国家有了不同的制度选择余地。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了,各国逐渐发展出不同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就 from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讨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尽管在后殖民状态下,西方的文化霸权依然存在,但其力量一直在削弱。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形成了巨大力量,如“金砖五国”的出现,西方七国之外又形成了有大量新兴市场国家参加的 G20 等。多文明状态再次出现。1991 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西方世界欢呼“历史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宣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终将统治世界的时候,萨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1993 年美国《外交事务》),指出,冲突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终结,恰恰相反,真正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此后他围绕着这个论题展开讨论,并于 1996 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该

① 曹顺庆、王超等:《比较文学变异学》,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6 页。

书明确指出,世界不再是由西方基督教文明统治,而是存在着多个文明体系,这些文明中最重要的是“儒家文明圈”和“伊斯兰文明圈”。当然还包括俄罗斯、印度等相对次要的文明圈。

亨廷顿的观点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各方面的激烈争论。他的冲突论当然是站在西方文明危机的立场上,具有强烈的挑战意味和右翼保守主义色彩。但他同时也确实揭示了在20世纪末世界文明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它的跨文明研究的特征正是对多元异质文明的承认。但与亨廷顿和西方思想家不同的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积极推动异质文明之间平等的对话、交流。曹顺庆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果不承认不同文明间的可比性,比较文学就不可能是真正全球性的理论学科。因此,西方学者仅仅强调‘同’是远远不够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绝不是为了简单的求同,而是在相互尊重差异性、保持各自文化个性与特质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①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哲学基础既包含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又吸收了西方后现代思想中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他者理论(列维纳斯)等观念,并将其运用到文学文化和文明研究中。曹顺庆新著《比较文学变异学》正是融汇中外、展开古代和后现代对话、消解文明本质主义的重要论著。在该书中,曹顺庆梳理了文化在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流变现象并阐释其基本变异机制、原则和路径方法。他不仅承认文明之间的“差异”,也研究它们之间的“相通”;不仅讨论文化的“起源”,更关注文化在流传中的“变异”和“生成”。可以说,比较文学变异学不仅是文明交流学,更是文明互鉴视域下的文明生成学。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文明的多元、互动、交流和生成,它表征了世界文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和基本发展趋势。

第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

^① 曹顺庆、王超等:《比较文学变异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7页。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①。演讲描述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强调了全球化进程加速带来的人类共命运同呼吸之特征的凸显，并进一步说明，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应该“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所秉承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其中的“互鉴”观念，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③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就在开始孕育生成。它首先意味着中国文化话语的自觉。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绝大部分阶段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的一百多年才被赶超和冲击。随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 1978 年改革开放，中国迅速崛起，中国现代文化的自觉也由此展开。首先是海外新儒家和中国港台比较文学界不断的呼吁，接着是中国大陆（内地）学者的反思。比如 1995 年曹顺庆提出的“中国文化失语症”，引起激烈争论，这正是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背景下的自觉意识的表现。此后，曹顺庆等不断呼应港台和海外学者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思考，强调中国学派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异质文明之间的比较和对话，其基础正是中国文化自觉。其次，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非要以中国中心主义替代西方中心主义，而是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基础上的文明互鉴。中国文化的自觉只是开始，是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平等自觉，它将这种自觉与中国文化自身中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相联系，也与西方理论的“交往理性”“包容他者”相结合，形成了视野广阔的比较文学“文明互鉴”理论，深刻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格局。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中国学者展开了扎实的工作。比如，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就深刻细致剖析不同文明之间互鉴的方式和路径，以及文明互鉴所带来的文明生长之效果。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还在继续成长中，它巨大的包容特性将会为比较文学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1 年第 1 期。

②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1 年第 1 期。

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1 年第 1 期。

建设带来充分的发展空间，也将进一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努力。

作者简介：

李涯，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英国文学。

陈佑松，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文艺学、电影学。